

THE OFFICE OF ROBERT T.Y. CHUNG 鍾庭耀辦公室

c/o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th Floor, Kennedy Town Centre, 23 Belcher's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香港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二十三號堅城中心5樓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代收
Telephone 電話: (852) 3921-2700 Fax 傳真: (852) 2517 6951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robert.chung@hku.hk

2009年3月13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譚耀宗主席

(以郵遞、傳真及電郵同時呈交，收件電郵地址 ftsang@legco.gov.hk)

譚耀宗主席：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9年3月16日舉行的會議

感謝 貴委員會於2009年2月24日來函，邀請本人出席 貴委員會於2009年3月16日舉行的會議，就票站調查表達意見。本人現先向 貴委員提交書面意見，方便當日討論。

自1991年開始，本人撰寫過不少文章，討論票站調查的方法和發展歷史。部份文章屬於研討會論文，部份則屬於報紙專欄文章。2004年9月立法會選舉過後，本人撰寫了一系列以票站調查數據為基礎的專欄文章，並在10月6日以「票站調查完結篇：專業操守不可無」一文為系列總結文章，討論票站調查與選舉工程的關係。文章論及的問題，四年後終於變成一場政治角力的焦點。

就四年多來發生的種種問題，實在罄竹難書，但本人對票站調查發展的原則和箇中專業操守的執著，18年來始終沒有改變。為了方便 貴委員會掌握本人的觀點和論據，本人特意把本人在2004年起發表有關票站調查發展的文章，連同一些參考資料輯成彙編，隨函附上。具體而言，有關彙編載有拙作12篇和參考文件4份，序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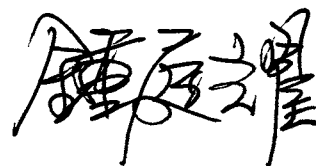
- (1) 「票站調查完結篇：專業操守不可無」(中文版)
- (2) 「票站調查完結篇：專業操守不可無」(英文版)
- (3) 「香港的票站調查」(英文函件)
- (4) 「香港家書——票站調查指引」
- (5) 「關於立法會選舉指引」(中文函件)
- (6) 「票站調查的爭論」(中文講稿)
- (7) 「票站調查的監管」(中文講稿)
- (8) 「票站調查系列——票站調查的專業操守」(中文文章)
- (9) 「票站調查系列——票站調查的海外經驗」(中文文章)

- (10) 「票站調查系列——美國總統選舉票站調查」(中文文章)
- (11) 「票站調查系列——選管會報告書引申的問題」(中文文章)
- (12) 「票站調查系列——票站調查研討會後記」(中文稿件)
- (13) 「世界民意研究學會關於票站調查及選舉預測的指引」(英文版)
- (14)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 2008 年 9 月 2 日發表的聲明(中文文件)
- (15)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 2008 年 9 月 3 日發表的聲明(中文文件)
- (16)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2008 年 9 月 5 日新聞公報(中英對照文件)

本人明白，貴委員會成員未必有空細閱所有文件。因此，本人已在相關文件的相對重要部份加上標記，方便閱讀。此外，本人在 2009 年 3 月 16 日出席貴委員會的會議時，亦會重點複述有關觀點，和集中討論以下課題：

- (1) 立法會議員的定位和角色
- (2) 政治團體的定位和角色
- (3) 傳播媒介的定位和角色
- (4) 研究機構的定位和角色
- (5) 學者專家的定位和角色
- (6) 選舉管理委員會的定位和角色
- (7) 政府官員的定位和角色
- (8) 市民選民的定位和角色

貴委員會邀請各界人仕到會議廳就票站調查表達意見，是一個進步。本人並不期望委員會成員，以至所有立法會議員，能夠在短期內就票站調查的未來發展達到一致意見。引用本人最近在一篇專欄文章所言，「各界人仕對票站調查的發展有不同意見，份屬正常，亦包含很多歷史原因。作為兩岸四地華人社會的典範，香港如果能夠參考國際社會的經驗，在符合學術自由、資訊自由和專業操守的前提下，發展出一套完善的票站調查制度，對華人社會的發展有深遠的意義。位處本地政治光譜中不同位置的各方人仕，如果能夠開心見誠，集思廣益，甚至既往不究，或許能夠覓得一條出路。」本人會盡力協助這個發展。



鍾庭耀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票站調查文章及參考資料彙編

論述票站調查之文章或文件

- (1) 「票站調查完結篇：專業操守不可無」(中文版)，於 2004 年 10 月 6 日發表，曾於 2008 年 3 月 13 日呈交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及於 2008 年 4 月 10 日呈交選舉管理委員會
- (2) 「票站調查完結篇：專業操守不可無」(英文版，“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Exit Poll Analysis: Professional Ethics Indispensable” translated by Carmen Chan)，於 2004 年 10 月 6 日發表，曾於 2008 年 3 月 13 日呈交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及於 2008 年 4 月 10 日呈交選舉管理委員會
- (3) 「香港的票站調查」(英文函件，“Exit Polls in Hong Kong”)，於 2008 年 3 月 13 日正式答覆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關於票站調查的詢問，曾於 2008 年 4 月 10 日呈交選舉管理委員會
- (4) 「香港家書——票站調查指引」，於 2008 年 4 月 5 日為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撰寫的「香港家書」，曾於 2008 年 4 月 10 日呈交選舉管理委員會
- (5) 「關於立法會選舉指引」(中文函件)，於 2008 年 4 月 10 日呈交選舉管理委員會
- (6) 「票站調查的爭論」(中文講稿)，於 2008 年 5 月 12 日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左右紅藍綠」播放
- (7) 「票站調查的監管」(中文講稿)，於 2008 年 5 月 13 日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左右紅藍綠」播放
- (8) 「票站調查系列——票站調查的專業操守」(中文文章)，刊於由香港電台出版之「傳媒透視」2008 年 9 月號
- (9) 「票站調查系列——票站調查的海外經驗」(中文文章)，刊於由香港電台出版之「傳媒透視」2008 年 10 月號
- (10) 「票站調查系列——美國總統選舉票站調查」(中文文章)，刊於由香港電台出版之「傳媒透視」2008 年 11 月號

- (11) 「票站調查系列——選管會報告書引申的問題」(中文文章)，刊於由香港電台出版之「傳媒透視」2009年1月號
- (12) 「票站調查系列——票站調查研討會後記」(中文稿件)，已投交香港電台出版之「傳媒透視」，將在2009年3月號刊登

票站調查之參考資料或文件

- (13) 「世界民意研究學會關於票站調查及選舉預測的指引」(原裝英文版, “Guidelines for Exit Polls and Election Forecasts issued by World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WAPOR)”), 於2006年12月10日發表, 曾於2008年3月13日呈交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及於2008年4月10日呈交選舉管理委員會
- (14)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於2008年9月2日, 就2008年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發表的聲明(中文文件)
- (15)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於2008年9月3日, 就2008年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發表的聲明(中文文件)
- (16)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於2008年9月5日, 就2008年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安排的公報(中英對照文件)

「票站調查完結篇：專業操守不可無」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鍾庭耀

註：本文為作者撰寫之「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分析系列」的最後一篇文章，於 2004 年 10 月 6 日在《信報》和《香港大學民意網站》同步刊登，粗體標記後來加上。

筆者聯同民意研究計劃的同事，寫了一連六篇關於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的分析文章，其實已經可以擱筆。但鑑於社會上仍然有不少人士誤會我們的工作，甚至把我們的調查與政黨的選舉工程混為一談，因此，筆者希望討論幾個關於票站調查的基本問題，作為本系列文章的總結。

本文引用的資料，除了關乎香港大學的民意研究計劃和學生研究隊者外，一律取自公開資料，筆者沒有向任何政黨或候選人打探他們的選舉作業。筆者關心的，是民意調查的專業發展。

1991 年香港進行首次立法局分區直選前，應否容許傳媒整天報導票站調查的結果，很快變成政府與電子傳媒間的爭論焦點。作為調查機構的代表，筆者在當年亦有參加一些高層會議。當時，政府沒有法律基礎禁止票站調查，但個別官員就曾經勸喻市民無須作答。感謝當時的傳媒機構，保著了香港的資訊自由。

當年選舉過後，筆者發表論文，詳細討論美國票站調查的經驗，和檢視票站調查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在美國，東西岸存在時差，東岸公佈票站調查結果時，西岸選民仍在投票。但是基於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聯邦法院仍然否決任何限制進行或發放票站調查的措施。不過，美國的傳媒基於專業自律，仍然不會在個別選區的投票結束前，發表當區的票站調查預測。

經過多年的實踐，香港的傳媒機構與政府之間逐漸出現共識，是政府不會立法禁止全日發放票站調查結果，但傳媒機構亦不會在投票結束前預測賽果。倘若傳媒不守規則，選舉管理委員會可以公開譴責。這種訴諸道德輿論力量多於刑法禁制的做法，與美國的制度看齊，我們應該好好珍惜。

根據選管會發出的選舉活動指引，有意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只要在選舉前七日，向選舉事務處呈交負責人及訪問員的個人資料及所選票站，便可以在選舉日在票站附近進行調查，但在禁止拉票區以外的活動，則不在限制之列。選管會今年增加透明度，在其網頁內公佈全部報請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名稱和工作人員姓名。就是由於多了這些公開資料，筆者得以在此分析一些鮮為人知的數字。

除了由筆者主持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和筆者協助推動的香港大學學生研究隊外，根據選管會公開的資料，還有 5 間機構在選舉日進行票站調查，分別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荃灣青年議會、香港社會及經濟研究所、香港青年協進會、和公共事務研究學會。筆者在去年區議會選舉前，與香港政策研究所負責策劃票站調查的主管，交流過票站調查的心得，其餘機構，則未有接觸。

筆者根據選管會網頁上的資料，再核對兩支香港大學研究隊的內部資料，整理出一個人力資源數表。由於選管會的資料有不少重疊之處，筆者只能盡量精確。數表顯示，七支研究隊中，公共事務研究學會最人強馬壯，其次是香港社會及經濟研究所，再其次是香港青年協進會，合共派出接近二千人在超過三百個票站進行調查。再細察三大機構所選的票站，區域分明，就算其中兩個機構在九龍東同時出現，選址亦無一重疊。筆者沒有考究該等機構的背景，但所動用的資源，的確令人咋舌。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13 年來進行的票站調查，都是爲了結合學術研究與傳媒報導的需要。因此，我們使用的問卷都是比較複雜和長篇的，並會把結果全面公開。我們一向主張採用科學的抽樣方法，減少對被訪者和其他調查機構的干擾。就以今次的選舉爲例，我們只派出了 107 名工作人員，在 101 個站外進行訪問，涉及的人力資源只及三大機構約 20 分之一。

爲了絕對保持中立，筆者從來不會在投票結束前，把結果通傳給參選人士。就算是贊助票站調查的傳媒機構，亦只會在晚上九時左右，才得悉選舉結果的初步預測。贊助機構亦承諾不會在選舉結束前公佈結果。有見近年來參選人士經常在選舉後半天，引用票站調查顯示選情告急，民意研究計劃特意在今年 9 月 10 日發出新聞公報，聲明一切類似口號與我們無關。

不過，選舉過後，由於民主派在港島區配票失敗，傳媒還是不斷揣測，我們有沒有把票站調查結果，及早通知民主黨。一篇專欄文章說：「到晚上七時記者致電羅致光報料，即使他認爲這是民建聯放出的『山埃』，也應有好奇心想知道馬丁的選情，爲何不打一個電話，去問一問正在做票站調查的港大鍾庭耀……」

民主黨的李柱銘，後來在其專欄中公開解釋民主黨沒有進行票站調查，而何秀蘭選情不穩的消息，是得自傳媒朋友透露的民建聯票站調查結果。那邊廂，民建聯的葉國謙，亦在選舉翌日公開承認民建聯曾經進行票站調查，並且在投票日下午四時半左右，透過票站調查得知李柱銘已經拋離蔡素玉。兩人的公開談話，總算給筆者還了一個公道。

筆者從不反對政黨或其他機構進行票站調查。相反，能夠把政策平台和選舉工程建立在科學數據之上，是社會的進步。筆者反對的，是調查機構以不誠實的手法套取選民的意見，秘秘密密地用作選舉工程。事實上，任何有意進行有關研究的機構，不論是智囊機構及政治團體，筆者一律願意分享經驗。須知道，惡性競爭最後只會浪費資源和干擾選民，甚至破壞選舉制度的公平性。

選舉委員會與傳媒機構多年來的共識，是投票結束前不會預測結果。雖然不少傳媒學者也會質疑這樣的安排會否鉗制資訊自由，但這個「香港模式」仍然運作良好。不過，如果個別參選人仕能夠透過某些渠道，取得這些寶貴的資訊。又或者，參選一方或雙方不斷地宣傳自己的票站調查結果，來支持自己的告急或分票策略。那末，選管會定下來禁止發放票站預測的指引，是不是變得毫無意義？

曾幾何時，香港的投票站外總是吵吵鬧鬧的。有人認為木人巷式的拉票活動可以製造氣氛，增加投票意欲。今時今日，這種想法已經落伍，一般選民都希望安靜地進入票站，投下神聖的一票。現在，不少人在提議設立選舉冷靜期，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和平理性的選舉文化，與先進社會看齊。

在筆者認識的民主國家之中，甚少政黨會在選舉當日進行票站調查，以配合最後一刻的選舉工程。如果一個社會的選舉結果，全繫於選民最後關頭的情緒反應（如槍擊案），或最後半天的選舉工程（如告急牌），那會是多麼的不幸！

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自我完善，去蕪存菁，自我揚棄有損專業精神而無助民智成長的不良活動。

數表：票站調查機構的人力資源分析

		港大民意 研究計劃	港大學生 研究隊	香港政策 研究所	荃灣青年 議會	香港社會及 經濟研究所	香港青年 協進會	公共事務 研究學會
香港島	選取票站數目	20	7	5	0	33	0	0
	固定訪員人數	20	14	12	0	375	0	0
	浮動訪員人數	全港 6 人	全港 9 人	0	0	港島 73 人	0	0
九龍東	選取票站數目	16	5	6	0	7	13	0
	固定訪員人數	16	11	13	0	21	60	0
	浮動訪員人數	全港 6 人	全港 9 人	0	0	0	九龍 7 人	0
九龍西	選取票站數目	13	4	2	0	0	14	0
	固定訪員人數	13	8	4	0	0	100	0
	浮動訪員人數	全港 6 人	全港 9 人	0	0	0	九龍 7 人	0
新界東	選取票站數目	24	10	13	0	0	0	118
	固定訪員人數	24	18	30	0	0	0	545
	浮動訪員人數	全港 6 人	全港 9 人	0	0	0	0	0
新界西	選取票站數目	28	5	4	9	0	0	121
	固定訪員人數	28	11	9	29	0	0	741
	浮動訪員人數	全港 6 人	全港 9 人	0	0	0	0	0
合計	選取票站數目	101	31	30	9	40	27	239
	工作人員數目	107	71	68	29	469	167	1,286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Exit Poll Analysis: Professional Ethics Indispensable”

Robert Ting-Yiu Chung
(Director of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ranslated by Carmen Ka-Man Chan
(Research Executive,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ote: This was the last articl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Exit Poll Analysis Article Series" written by the author.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rticle was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nd the "HKUPOP Site" at <http://hkupop.hku.hk/> on 6 October 2004. **Bold-type highlights** were added afterwards.*

The author, together with the colleagues of the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has written a series of 6 articl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and in fact we can stop at this point. Yet, since there are still some people in the society who have misunderstood our work, and even confused our survey with the election engineering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e author thus would like to have a discussion on a few basic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exit polls as a conclusion of this series of articles.

Except fo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HKU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and the Student Research Team, all other information quoted in this article were extracted from open information. The author had not inquired about any news from any political parties or candidates. What concerns the author most is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opinion polls.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geographical direct election in 1991, whether the media should be allowed to report the exit poll during the whole election day had soon become the focus of argu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lectronic media.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search agency, the author also participated in some top-level meetings at that time. At that time, the government had no legal basis to ban exit polls, but **individual officials had urged the citizens not to respond to those exit polls**. Thanks to the media bodies at that time,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was preserved in Hong Kong.

After the election then, the author had written an article to discuss the experiences from the exit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xamine their effect to the electoral behaviour of the voters. As there is a time lag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coa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 exit poll result is released in the Eastern coast, voting is still going on in the Western coast. However, as the freedom of speech is granted by the constitution, the Federal Court still vetoes any measures which will limit the conduct of exit polls and the release of the their results.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media's professionalism and self-control, they will not release the exit polls' forecast of that state before the close of voting in individual states.

After many years' practice, **a consensus has been formed gradually between the media bodies and the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legislate to ban the release of the

exit poll result for the whole day, while the media bodies would not publish the predictions before the close of poll. If the media fails to observe the regulations,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EAC) can condemn it publicly. **This practice, which seeks to resort to the moral and public power instead of the legal ban, is the same as the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should treasure this.**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issued by the EAC, for organizations intended to conduct exit polls, they only need to submit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person-in-charge and the interviewers, as well as the selected stations, to the EAC 7 days before the election, then they can conduct exit polls around the polling stations on the election day, while activities beyond the “No Canvassing Zone” are not limited. This year, the EAC has raised its transparency and released all the names of organizations and workers involved which have applied for conducting exit polls. With the help of these addi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the author could analyze some rarely noticed figures here.

According to the EAC’s information, apart from the HKU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and the HKU Student Research Team, which are headed and supported by the author respectively, 5 more organizations conducted exit poll on the election day. They were the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Tsuen Wan Youth Council, Hong Kong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Centre, Hong Kong Youths Unified Association,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Society. Before th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last year, the author has exchanged ideas with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exit polls in the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other organizations, the author has not got in touch with them.

Basing on the information on the website of the EAC, together with the internal information of the 2 research teams in HKU, we come up with a frequency table on human resources. Since there are quite a lot of overlaps in the EAC’s information, the author could only be as accurate as possible. The table shows that, among the 7 research teams, the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Society had the largest manpower. The Hong Kong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Centre, and then Hong Kong Youths Unified Association followed. Nearly 2,000 people had been sent out from these 3 organizations to over 300 stations to conduct exit polls. When one takes a careful look at the selected stations of these 3 organizations, their district distribution was clear-cut. Even though 2 organizations were found in Kowloon Eas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completely no overlap of selected stations. The author had not investigated the background of these organizations, but their resources deployed were really surprising.

The exit polls conducted by the HKU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over these 13 years aimed at meeting the needs of both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media coverage. Therefore, the questionnaire we used was relatively complex and long, and the result would be fully published. We have all along advocated a scientific sampling method, so as to minimize the disturbance to the respondents and the other research agencies. Take this election as an example, we have only sent 107 workers and conducted interviews in 101 polling stations. The human resource involved was only one-twentieth of the 3 main organizations’.

To maintain absolute neutrality, **the author has never released the result to the candidates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election. Even the media bodies which have sponsored the exit polls would only know the preliminary forecast of the election result at around 9:00 pm.** The sponsors have also promised not to release the result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election. **In view of the candidates’ appeal to the voters basing on the exit poll result after half of the election day these years, the HKU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deliberately issued press release on September 10 this year to state that all similar slogans were irrelevant to us.**

However, after the election, since the democratic camp experienced a failure in the vote allocation on Hong Kong Island, the media has kept on suspecting whether we have informed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exit poll result. One column article said, "At 7:00 pm the reporter phoned Law Chi-Kwong to inform him the news. Even though he thought this was the fake news released by the DAB, he should be curious to know Martin Lee's situation. Why didn't he make a call to ask Robert Chung in HKU who was conducting the exit poll..."

Later, **Martin Le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penly explained in this column article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did not conduct exit polls, and the critical situation of Cyd Ho was only known from the DAB's exit poll result released by his friends working in the media. On the other side, on the day after the election, **Yip Kwok-Him of the DAB** publicly admitted that the DAB has conducted exit polls and has known from the exit poll result that **Martin Lee was greatly ahead of Choy So-Yuk at about 4:30 pm on the election day**. The public speeches of the 2 people have eventually done justice to the author.

The author never objects any political parties or other agencies conducting exit polls. On the contrary, being able to base policy platforms and election engineering on scientific figures is the advancement of the society. What the author opposes, is the research agencies' use of dishonest means to gauge voters' opinions for their election engineering secretl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share his experiences with any agencies, whether think-tanks or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interested in conducting these researches. One should know, vicious competition will only lead to waste of resources and annoyance to voters, and even ruin the fairness of the election system.

The consensus reached between EAC and the media after so many years is that there will be no forecast of election results before the close of poll. Although some media academics have suspected whether this kind of arrangement will limit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this kind of "Hong Kong model" works well so far. However, **if individual candidates are able to obtain some valuable information through some channels, or one side or both sides keep on using the exit poll results to support their own appeals and vote allocation strategies, the guidelines set by EAC to prohibit the release of exit poll results will become meaningless.**

Some time ago, there were always noises and crowds outside the polling stations in Hong Kong.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this kind of polling activity can create the atmosphere and raise people's intention to vote. Nowadays, this kind of thought has become out-dated. Voters generally want to enter the polling stations silently to cast their sacred votes. At present, some people advocate setting a "cool-down" period for the election, aiming at establishing a set of peaceful and rational electoral culture so as to be in line with the advanced society.

Among the democratic countries which the author knows, the political parties will rarely conduct exit polls on the election day to match their last-minute election engineering. If a society's election result completely hinges on the voters' emotional response in the last stage (such as a shooting case), or the last 12 hours' election engineering (such as candidates' appeals to voters with their critical situation), that will be a great misfortune.

Hopefully our society can seek self-improvement and get rid of those unhealthy activities which are detrimental to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unhelpful to the growth of civic wisdom.

Table: Manpower allocation for different exit poll organizations

		Code of Researchers**						
		1	2	3	4	5	6	7
HKI	No. of stations	20	7	5	0	33	0	0
	Fixed interviewers	20	14	12	0	375	0	0
	Floating interviewers	6*	9*	0	0	73(HKI)	0	0
KLE	No. of stations	16	5	6	0	7	13	0
	Fixed interviewers	16	11	13	0	21	60	0
	Floating interviewers	6*	9*	0	0	0	7(Kln)	0
KLW	No. of stations	13	4	2	0	0	14	0
	Fixed interviewers	13	8	4	0	0	100	0
	Floating interviewers	6*	9*	0	0	0	7(Kln)	0
NTE	No. of stations	24	10	13	0	0	0	118
	Fixed interviewers	24	18	30	0	0	0	545
	Floating interviewers	6*	9*	0	0	0	0	0
NTW	No. of stations	28	5	4	9	0	0	121
	Fixed interviewers	28	11	9	29	0	0	741
	Floating interviewers	6*	9*	0	0	0	0	0
Total	No. of stations	101	31	30	9	40	27	239
	No. of workers	107	71	68	29	469	167	1,286

* mobile across the whole territory

**Code of researchers:

1 = HKU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2 = HKU Student Research Team (香港大學學生研究隊); 3 =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香港政策研究所); 4 = Tsuen Wan Youth Council (荃灣青年議會); 5 = Hong Kong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Centre (香港社會及經濟研究所); 6 = Hong Kong Youths Unified Association (香港青年協進會); 7 =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Society (公共事務研究學會)

THE OFFICE OF ROBERT T.Y. CHUNG 鍾庭耀辦公室

c/o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F, Kennedy Town Centre, 23 Belcher's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香港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二十三號堅城中心 5 樓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代收
Telephone 電話: (852) 3921-2700 Fax 傳真: (852) 2517 6951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robert.chung@hku.hk

13 March 2008

Mr Thomas Wong
Research and Library Services Division (RLSD)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ar Mr Wong,

Exit polls in Hong Kong

Thank you for your email of 25 February 2008 inviting me to submit my views on the operation of exit polls in Hong Kong. Thank you also for accommodating my overseas conference schedule, so that I can make my submissions beyond your proposed date. I hope my submission herewith would be useful to all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in their deliberation on whether or not to "regulate" exit polls in Hong Kong, and if yes, how. I will begin by stating my general position, then give a historical treati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xit polls in Hong Kong, and then proceed to answer your specific questions.

My general position

- As with my other submissions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t various times, I assume my submission would ultimately be placed in the public domain. To accelerate this process, I intend to publish my submission at our "HKU POP Site" at <http://hkupop.hku.hk/>, possibly in bilingual format, and through other media as well, as soon as my submission has been discussed.
- Although I am the Director of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POP)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current member *cum* former Secretary-Treasurer of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WAPOR), my submission neither represents the view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or WAPOR. I have nevertheless informed the current and one former President of WAPOR of my submission, and they may write to you directly on this matter.
- I consider academic and press freedoms to be of utmost importance to our society, and any restriction on such freedoms must be exercised with extreme care and would only be introduced with the strongest justification. In this respect, we should set a good example for other Chinese and Asian societies.
- To me, academic and press freedoms could only be curtailed by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principles and ethics, upon balancing individual rights with public interest in light of local conditions. In the area of opinion research, including exit polling, the WAPOR standards should be our prevailing guide.

THE OFFICE OF ROBERT T.Y. CHUNG 鍾庭耀辦公室

c/o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F, Kennedy Town Centre, 23 Belcher's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香港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二十三號堅城中心 5 樓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代收
Telephone 電話: (852) 3921-2700 Fax 傳真: (852) 2517 6951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robert.chung@hku.hk

- I am very much aware that there are ample cases of malpractice in Hong Kong, like the proliferation of sub-standard polls and partisan exit polls. Nevertheless, I believe the freedom of all persons and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should be equally protected, so that professional polling can freely develop through proper civic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advancement. I urge all persons and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including exit pollsters, to treasure this freedom and find ways to improve themselves/ourselves.

A historical treatise of exit polling in Hong Kong (Please also read Annexes 1 and 2)

- Direct elections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vel first took place on 15 September 1991. On that same day, POP ran its first exit poll. The administration then was worried that chaos of some sort might arise if exit poll results could be broadcast throughout the election day. There was, however, no legal ground to ban exit poll, so a number of meetings were held among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media company representatives and exit poll researchers (including myself) before the election. In the name of press freedom, media professionals refused to pledge non-disclosure, so government officials urged voters not to respond to exit poll interviews. Although consensus was not reached, the media exercised self-constraint and did not announce exit poll predictions before the close of poll.
- On 23 July 1993, the administration set up a three-member Boundary and Election Commission (BEC) to take charge of electoral matters. On 16 May 1994, BEC issued its first set of "Proposed Guidelines on Election-related Activities in respect of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Elections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One chapter of the Guidelines dealt with the conduct of exit polls and the announcement of exit poll results, and the Guidelines have since then become the legal tool for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gulate" exit polls.
- Due to the success of the early exit polls, credibility gradually built up around these polls. The explicit objective of BEC's exit poll guidelines was simply "to avoid unfair interference with the election process by unduly influencing electors". BEC only appealed to the media and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to refrain from announcing the results of exit polls or making specific remarks or predictions on individual candidate's performance until after the close of poll", and if any organization failed to comply, BEC would "make a denunciation or censure in a public statement." This means social pressure rather than legal sanction was the main tool.
- In 1995, BEC further required all exit poll researchers to register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seven days before any election, otherwise their interviewers would not be allowed to conduct exit poll within the "no canvassing area" which usually covers many street blocks around the polling station. The media and researchers did not object to this new arrangement, because the Guidelines did not provide any vetting of application by the administration. Any researcher who gave seven days' notice would be allowed to conduct exit poll.

THE OFFICE OF ROBERT T.Y. CHUNG 鍾庭耀辦公室

c/o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F, Kennedy Town Centre, 23 Belcher's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香港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二十三號堅城中心 5 樓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代收
Telephone 電話: (852) 3921-2700 Fax 傳真: (852) 2517 6951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robert.chung@hku.hk

- That year, on 17 September 1995, another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was held. Without proper consultation, BEC extended the polling hours for the Election Committee Constituency election from 10:30 pm to 12:00 midnight, but not the other elections held on the same day. A grey area was generated, and the media insisted on announcing the predictions of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Elections at 10:30 pm. BEC proceeded to denounce three news media on 16 October 1995, but had never adopted inconsistent polling hours again.
- After the 1997 handover, BEC was also renamed as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EAC). In 2004, it revised the Guidelines to say that upon receipt of an exit poll application, it “will consider the application and issue approval to the concerned person or organisation as appropriate”, meaning that it now has the right to reject applications, even though nothing in the Guidelines provides for any ground for rejecting applications. Up to now, as far as I am aware of, no such action has ever been taken. The 2004 Guidelines also provides for the public announcement of al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viewers allowed to conduct exit polls “prior to the polling day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public and candidates and such a list will also be displayed at the respective polling stations”. It turns out that such information was also published online.
- Since the emergence of exit polls in Hong Kong more than 16 years ago, a consensus has gradually been formed, whereby the government would not legislate against the release of the exit poll results, while the media would not publish the predictions before the close of poll. This kind of consensus based on self-constraint an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public justice should be treasured. Although the administration now has right to reject exit poll applications, it has not generated any opposition because there is not yet a case to be challenged, thanks to the prudence of many journalists and exit poll researchers. However, recent development of partisan exit polls conducted on enormous scales has seriously challenged the consensus reached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rofessional practitioners.
- It is no longer a secret that candidate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use exit polls for their election engineering. As early as 5 December 1993, I have seen a political party running a large-scale exit poll at a District Board by-election. During the municipal council elections of 5 March 1995, another academic researcher has recorded that about 60% of the candidates from one particular party conducted exit polls as part of their election engineering. The data collected was sent back to their headquarters for instant analysis and manpower deployment.
- In 2004,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released by EAC at its website,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held on 12 September 2004, a consortium of exit pollsters belonging to one political camp has deployed nearly 2,000 people to conduct exit polls at more than 300 polling stations. The human resource involved was about 20 times that of a media-sponsored non-partisan exit poll operation. Such partisan operations have grown even bigger in 2007. For th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 held on 18 November 2007, the same consortium deployed about 2,200 people to conduct a partisan exit poll covering over 370 polling stations.
- The author wrote in 2004, “The author never objects any political parties or other agencies conducting exit polls... What the author opposes, is the research agencies’ use of dishonest

THE OFFICE OF ROBERT T.Y. CHUNG 鍾庭耀辦公室

c/o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F, Kennedy Town Centre, 23 Belcher's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香港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二十三號堅城中心 5 樓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代收
Telephone 電話: (852) 3921-2700 Fax 傳真: (852) 2517 6951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robert.chung@hku.hk

means to gauge voters' opinions for their election engineering... The consensus reached between EAC and the media after so many years is that there will be no forecast of election results before the close of poll... if individual candidates are able to obtain... exit poll results to support their own appeals and vote allocation strategies, the guidelines set by EAC to prohibit the release of exit poll results will become meaningless." (Annexes 2 and 3)

- According to the WAPOR Guidelines for Exit Polls, "Exit polls can serve three different functions that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predicting election results; describing patterns of voter support for parties, candidates, and issues; and supporting extensive academic research efforts... Exit polls conducted for public consumption should be impartial and non-partisan. Exit polls are scientific research designed to collect data and report information on electoral outcomes. They are not tools for partisan advocacy." (Annex 3)

Answers to specific questions

(Raised in Annex 1)

(a) Under the guidelines, exit polls may be conducted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Do you think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conducting exit polls should be subject to certain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should exit polls be only conducted by academic institutions or registered members of certai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organizations for conducting opinion polls?

-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conducting exit polls within the "no canvassing areas" should (a) pledge to follow the WAPOR Guidelines for Exit Polls and Election Forecasts, adapted to suit local conditions, and (b) pledge not to use the data for election-day engineering. The Guidelines specifically stipulate, among other provisions, that "no statement about the outcome of an election based on exit polls should be published before all the polls in the contest have closed", that "exit polls should be impartial and non-partisan", that "they are not tools for partisan advocacy", and that "they should adhering to the standards of minimal disclosure". WAPOR noted that "political parties may sometimes make claims about private data", but these claims also require documentation, and any public statement referring to exit poll results should abide by these disclosure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Annex 3)

(b) Do you think candidates and political parties should be prohibited from conducting or sponsoring exit polls?

-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in my answer to Question (a) includes "any candidate or political party". Provided that the candidates and political parties concerned (a) pledge to follow the WAPOR Guidelines for Exit Polls and Election Forecasts, adapted to suit local conditions, and (b) pledge not to use the data for election-day engineering, they should be allowed to freely conduct or sponsor exit polls. In essence, that means they would not (a) use the data for election-day engineering, thereby creating unfairness to other candidates and political parties as well as defeating the purpose of setting up "no canvassing areas", and (b) mislead voters into believing that their poll is impartial and non-partisan.

(c) Under the guidelines,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intending to conduct exit polls must make

THE OFFICE OF ROBERT T.Y. CHUNG 鍾庭耀辦公室

c/o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F, Kennedy Town Centre, 23 Belcher's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香港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二十三號堅城中心 5 樓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代收
Telephone 電話: (852) 3921-2700 Fax 傳真: (852) 2517 6951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robert.chung@hku.hk

applications to the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REO) at the latest 7 days before the polling day; on the receipt of the application, REO will consider the application and issue approval to the concern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as appropriate. Do you think this requirement for application is reasonable?

- I think this is reasonable, provided that flexibility is allowed in the final selection of polling stations and deployment of interviewers, because these logistics have to be fine-tuned in the final stage of survey planning in light of campaign development. Provided that the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have made the pledges mentioned before, REO should not reject any application unless it has a very sound reason to do so, based on public interest. Up to this moment, I have not heard of any case of rejection. This is appreciated.

(d) Do you think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which have conducted exit polls at a LegCo or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should be required to submit a report to REO or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on the results of exit polls, the use of the results and information on the conduct of exit polls (such as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sponsors of exit polls, the wordings of questions, sampling size and method and margin of error)?

- No, adhering to the WAPOR standard of “minimal disclosure” should be enough. Items for minimal disclosure includes name of the sponsor, researcher, whether the data collector has any business or personal ties to political parties, candidates,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or governmental bodies, the sampling method, whether the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at polling places, at homes, by phone, and so on. While a report to REO or EAC is not necessary, all persons and organizations intending to conduct exit polls should supply their names and addresses to REO or EAC for publication. An explicit statement on the purpose of their exit poll should also be encouraged. Any such statement submitted should also be published for public reference.

(e) Under the guidelines,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appeals to the media and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to refrain from announcing the results of exit polls or making specific remarks or predic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candidate or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list until after the close of poll. Do you think this appeal should be turned into a statutory requirement?

- No. The current system of appealing to the media and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for cooperation and making “a denunciation or censure in a public statement” if any organization fails to comply has worked well for over 16 years. Our media and researchers have *de facto* followed the WAPOR standard in this aspect, and we should be proud of ourselves. According to the WAPOR Guidelines, “WAPOR and ESOMAR oppose regulation of the conduct and reporting of polls in principle. However, no statement about the outcome of an election based on exit polls should be published before all the polls in the contest have closed...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other than voting behaviour may be published before the polls have closed.” It would be nice if the media and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would voluntarily pledge themselves to follow the WAPOR standard.

(f) Do you think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conducting exit polls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provide

THE OFFICE OF ROBERT T.Y. CHUNG 鍾庭耀辦公室

c/o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F, Kennedy Town Centre, 23 Belcher's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香港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二十三號堅城中心 5 樓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代收
Telephone 電話: (852) 3921-2700 Fax 傳真: (852) 2517 6951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robert.chung@hku.hk

exit poll data to candidates or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for their use before the close of poll?

- Agreed. The whole idea of setting up “no canvassing areas” is to prevent candidates from gaining undue advantage over other candidate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polling station on polling day. Allowing partisan exit polls within the “no canvassing areas” defeats the purpose. Also, very so often in the middle of an election day, some candidates or political parties would claim that they are in crisis because exit poll reveals that they are trailing behind. According to the WAPOR Guidelines, such claims also require documentation and disclosure of essential items,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y are not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g) Do you think exit polls should be banned on polling day in Hong Kong?

- Definitely not. We must treasure our freedoms of information and academic inquiry. No poll of any sort should be banned or restricted in its conduct or publication – be it pre-election poll, exit poll, or any other type of poll, whether it is impartial or partisan, and whether it is professionally done or not. Sub-standard polls should only be regulated by the academia and the industry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

(h) Do you have any other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on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exit polls under the guidelines?

- EAC should continue to announce for public reference a list “of such persons or organisations allowed to conduct exit poll” (a) via its website prior to the polling day, and (b) at the respective polling stations on polling day. In some recent elections, such a list was not displayed in some polling stations where exit polls were conducted. Moreover, if a candidate or political party commissions a polling organization to conduct exit polls and uses the results for election-day engineering, the cost of the service involved should be counted as an election expense for the candidate or political party concerned.

I hope my submissions together with the three annexes would be useful to all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in their deliberation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xit polls in Hong Kong.

Yours sincerely,



Robert Ting-Yiu Chung
Director of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家書 —— 票站調查指引」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

註：粗體標記後來加上。

昊藍小女：

十一年前，妳還是一個九七嬰兒，牙牙學語。十一年後，妳已經羽翼初成，躍躍欲試。

當妳初出娘胎的時候，爸爸媽媽經常反問自己：究竟我們希望將來的藍藍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個聰明本事的人、漂亮端莊的人、還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換言之，究竟我們希望妳做個「叻」人、「靚」人、還是好人？

如果真是須要任擇其一的話，爸爸會毫無保留地希望妳「做個好人」。因為，靚人只會曇花一現，「叻」人可能會誤入歧途，為禍人間。只有做個好人，才能真正享受人生，感染社會。

就好像爸爸做了十多二十年的民意研究工作一樣，如果沒有一套專業操守和道德規範，無論技術有多進步，研究有幾先進，到頭來，可能亦只是為特權階級服務。什麼學術自由、資訊自由，可能全部要被大戶收購，可能都要向政治低頭。

社會最近討論票站調查，當中提到不少公平與否，規管與否的問題。爸爸認為，這些其實都是隔靴搔癢，找不到問題的核心。因為，大家似乎只是著眼於技術問題，而忽略了當中的道德操守。

有人說，一些候選人過往沒有進行票站調查，很吃虧，不如人人不准做，會公平些。爸爸其實非常明白這種想法，亦十分同情過去被別人佔了便宜的人。不過，在維護學術自由和資訊自由的前提下，與其人人不准做，不如人人可以做，會更加理想。當然，如果人人都可以做的話，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如果有人把票站調查的資料用作選舉當日的配票策略和人手調配的話，票站調查的開支便應該計算在選舉經費之內。選舉法例既然設立了「禁止拉票區」，不准候選人在票站附近進行選舉工程，如果政府又容許候選人在「禁止拉票區」內進行以選舉工程為目標的票站調查，不是自打嘴巴？當然，如果票站調查是用作賽後分析，或者是在「禁止拉票區」外進行，則可以另作別論。

事實上，票站調查自六十年代開始在世界各地興起以來，主要用途都是賽果分析，和讓傳媒在投票結束後可以即時預測結果，可謂報導與研究雙結合。在香港，候選人士靠鑽法律空子而進行大規模的選舉工程票站調查，可謂世間罕見。

在不少場合，爸爸都詢問過不少國際級的學者和專家：為什麼比香港更加民主和進步的社會沒有出現類似情況？答案是：人家有專業操守管制民意調查，根本無須鬼鬼祟祟地進行票站調查，用來配票和動員。

因此，爸爸從來沒有牽頭要求政府管制票站調查。不是因為爸爸不明箇中底蘊，而是希望同業遲早懂得自律，和明白專業操守的重要。事實上，如果候選人是需要把票站調查數據作為結果分析的話，爸爸會呼籲所有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在選舉後把數據全面公開，集思廣益。

又或者，如果政府認為在投票結束前，只要調查機構沒有透過新聞傳媒公佈調查結果，就算是不斷地向候選人士或者團體提供調查資料，都是符合選舉指引的話，爸爸就會建議新聞傳媒在促進資訊自由的前提下，考慮向所有參選人士同時提供票站調查的數據，讓資訊變成社會公器。

過去十多年來，爸爸雖然看到很多不專業不科學的調查在本地滋長，亦遇過很多脫離理性的爭論，但爸爸都可以逆來順受。因為爸爸相信，人在做，天在看，社會總會進步，只要堅持真理，把一切事情都放在陽光之下，紀錄在歷史之中，便無須太過介懷眼前的名利得失。

藍藍，妳大概已經聽過華盛頓砍伐櫻桃樹的故事。香港正在發展民主政制，路途遙遠，錯誤在所難免。在發展配套制度的同時，部份人士比較急功近利，鑽了法律空子，甚至欺騙了部份市民。就讓我們把它變成歷史好了。展望將來，香港人如果希望繼續在華人社會中保持優勢，就一定要在自由和法治基礎之上，好好發展專業精神和道德操守。

昊藍，在妳長大之後，希望香港社會不會是一個爾愚我詐，敵我分明的社會。希望妳會體會得到，做一個善良的人，總比一個只會賣弄聰明或者全靠外表的人，更加快樂，更加幸福。

爸爸

2008年4月5日

THE OFFICE OF ROBERT T.Y. CHUNG 鍾庭耀辦公室

c/o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th Floor, Kennedy Town Centre, 23 Belcher's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香港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二十三號堅城中心 5 樓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代收
Telephone 電話: (852) 3921-2700 Fax 傳真: (852) 2517 6951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robert.chung@hku.hk

2008 年 4 月 10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選舉管理委員會
彭鍵基主席

(以電郵、傳真及手遞呈交；收件電郵地址：eaceng@reo.gov.hk；收件傳真 2511 1682；收件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25 號海港中心 10 樓選舉管理委員會秘書處)

彭鍵基主席：

關於立法會選舉建議指引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自 1991 年成立以來，在絕大多數各級地方選舉之中，包括各級議會的補選，都有進行票站調查，而且每次都有知會選舉事務處，及與處方保持密切聯絡。事實上，遠自選舉管理委員會在 1993 年成立以前（在 1997 年 9 月前稱為「選區分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及至胡國興法官在 2006 年 8 月卸任委員會主席為止，本人曾經多次與胡主席及處方人士會面，就票站調查的發展交換意見。

2. 自從 閣下上任以來，本人未及拜訪選管會商談票站調查的發展，一則因為事忙，二則因為港大民研計劃一直與選管會及處方合作無間。不過，近日社會輿論開始關注票站調查的發展，而選管會亦在最近發出的《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在票站調查部份作出修改建議，本人於是藉此機會向選管會提出意見。

3. 本人會先向 閣下申述三項關於規管票站調查的原則，然後就選管會最近提出的修改提出意見。在未開始陳述意見之前，懇請 閣下注意（1）本意見書屬於公開文件，稍後會上載到《香港大學民意網站》(<http://hkupop.hku.hk>)；（2）本文件夾有以下附件：

- 附件 1：本人 2008 年 3 月 13 日函件，正式答覆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關於票站調查的詢問；
- 附件 2：本人於 2004 年 10 月 6 日發表的文章，題為「票站調查完結篇：專業操守不可無」，中文版，曾經連同附件 1 呈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 附件 3：上述附件 2 的英文版本，曾經連同附件 1 呈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 附件 4：世界民意研究學會關於票站調查及選舉預測的指引，曾經連同附件 1 呈上立

THE OFFICE OF ROBERT T.Y. CHUNG 鍾庭耀辦公室

c/o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th Floor, Kennedy Town Centre, 23 Belcher's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香港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二十三號堅城中心 5 樓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代收
Telephone 電話: (852) 3921-2700 Fax 傳真: (852) 2517 6951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robert.chung@hku.hk

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 附件 5：本人在 2008 年 4 月 5 日為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撰寫的《香港家書》，討論票站調查的發展。

上述附件載有不少關於票站調查的理念探討、參考數據、國際標準，和與票站調查指引部份沒有直接關係的討論（例如應否把票站調查經費納入選舉經費之內等），在此從略。

4. 基於維護學術自由和資訊自由的前提下，本人希望所有針對票站調查以至一般民意調查的規管，應該根據下列原則制訂：

- (1) 政府愈少監管愈好；
- (2) 資訊流通愈暢順愈好；
- (3) 專業守則愈早制訂愈好。

5. 關於票站調查的指引，選管會最近提出以下修訂：

- 重點列明傳媒和機構在進行票站調查時必須遵守的重要原則（第 15 章 15.2 至 15.9 段）；
- 納入額外措施，以收緊對票站調查的管制，並提高獲准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人士的透明度（第 15 章 15.7 和 15.9 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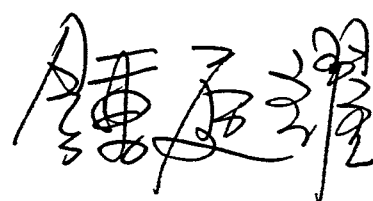
6. 基於政府愈少監管愈好的原則，本人同意選管會呼籲「傳媒及各有關機構」在「進行」、「公布」和「廣播」票站調查時，保持自律，並在得悉任何機構違反有關指引時，「發表公開聲明對其作出嚴厲譴責或譴責」。本人認為，在促進專業發展的前提下，任何更加強烈的處份，應該交由業界制訂和執行，而非透過立法規管。當然，專業守則發展需時，但如果選管會能夠善用「譴責」的方法，對促進有關發展會有一定幫助。

7. 不過，在行駛「譴責」權力的同時，選管會應該明確界定何謂「公布票站調查結果」。選管會現把以往「呼籲傳媒及有關機構，應待投票結束後，才公布票站調查結果」，改為「提醒傳媒及有關機構，在投票結束前，不可公布票站調查結果」，是完全沒有針對近年發展的不良趨勢，即候選人利用政府批准在「禁止拉票區」內進行的票站調查，作為選舉當日選舉工程的重要部份。本人建議，選管會在票站調查指引中明確說明，有關行為有否違反選舉指引，而會招致選管會「嚴厲譴責或譴責」。本人注意到，截至目前為止，負責政制事務的主要官員，始終沒有清楚說明有關行為是否違反指引。作為由行政長官委任的獨立委員會，選管會應該以公平公開的態度，審視有關問題，對症下藥。

THE OFFICE OF ROBERT T.Y. CHUNG 鍾庭耀辦公室

c/o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th Floor, Kennedy Town Centre, 23 Belcher's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香港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二十三號堅城中心 5 樓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代收
Telephone 電話: (852) 3921-2700 Fax 傳真: (852) 2517 6951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robert.chung@hku.hk

8. 倘若選管會確認有關活動是符合指引，則可以預期，以選舉工程為主的票站調查數目和規模都會不斷增加，而在民意調查專業守則尚未確立之前，有關調查的操作和質素會更加良莠不齊。此外，倘若有關活動沒有違反指引，本人會考慮修改以往與委託票站調查機構達成的協議，不再過問它們會否把調查資料，全日提供給其他人士。事實上，如果傳媒或研究機構會把票站調查的資料，同時提供給所有參選人士的話，選舉可能會變得更加公平，資訊會更加流通地成為社會公器。
9. 關於在投票結束前，傳媒機構不應就「個別候選人或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的表現發表具體評論或預測」的條文，其實已經行之有效。本人只想指出兩點：(1) 所有與預測選舉結果無關的票站調查資料和評論，一向不在此列；(2) 不少候選人在投票結束前，會引用不知出處的票站調查數據，公開宣佈自己選情「告急」，似乎已經違反指引。
10. 最後，關於有意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須於 10 日前向選舉事務處申請，而非以往 7 日通知的要求，本人認為可以接受。不過，本人需要指出，在 1995 年後及 2004 年前，票站調查機構只須在 7 日前知會選舉事務處，無須提出正式申請。選管會後來把知會變成申請，現在又把 7 日加至 10 日，其實是把行政需要局部凌駕於研究自由之上。本人仍然認為有關改動可以接受，是基於對處方的信任，亦假設票站調查的訪員和票站名單，可在最後階段作出合理修正。本人希望，在社會建立票站調查專業守則之後，有關時限可以相應縮短。
11. 上述意見，希望會對 貴委員的諮詢工作上有所幫助。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鍾庭耀 呈上

「票站調查的爭論」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鍾庭耀

註：此為 2008 年 5 月 12 日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左右紅藍綠」的講稿，粗體標記後來加上。

今年是選舉年，社會最近討論選舉票站調查，是一個前奏。不過，最近的討論，就出現了兩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第一：為什麼爭論在這個時候出現？

第二：為什麼有關爭論只是集中在泛民議員和林瑞麟局長之間？

爭論在這個時候出現，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今年的立法會選舉特別重要

幾乎所有分析都說，如果泛民在 9 月的選舉中得不到 20 席，政府就可以在政制發展的問題上為所欲為。所以，泛民需要寸土必爭，不能再被對手以票站調查佔便宜。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因為由政黨進行的票站調查，影響程度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其實，票站調查早在 1991 年已經引入香港，而政黨比較有系統地使用票站調查作為選舉工程，在 1993 年王屋區議會補選中已經出現。1995 年，學者蔡子強已經在其著作中指出，有政治團體在選舉中大量使用票站調查。政黨使用票站調查進行選舉工程，在政圈中已經是公開秘密。近年不同的，是這些調查開始全面企業化和科技化，但就沒有相應透明化，於是觸發有關調查應否納入選舉經費？選民有否受到誤導？等比較嚴重的問題。

從社會發展和專業操守的角度看，現在開始檢討票站調查，似乎是一個合適的好時候。

不過，這就帶出了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有關討論只是集中在泛民議員和林瑞麟局長之間？

我認為原因有三個：議員捉錯用神、官員越俎代庖、傳媒分析不足。

與鄰近地區比較，香港的選舉算是比較文明和乾淨，因為香港的法治制度比較完善，行政機關比較中立。在過去 15 年，香港選舉的重要事務，都是由最高權力委任的獨立委員會負責。

因此，當議員追問局長會否監管票站調查時，局長應該說交由選管會處理便可。選管會由特首任命，主席必定是法官，兼且要先諮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後才任命，代表香港的法治精神，公信力應該不錯。

議員以前沒有向選管會投訴，局長現時又代表選管會發言，而傳媒又只把焦點放在新舊官員之間的矛盾，和泛民與局長之間的爭辯，其實都是捉錯用神，對票站調查的未來發展沒有太大幫助。

「票站調查的監管」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鍾庭耀

註：此為 2008 年 5 月 13 日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左右紅藍綠」的講稿，粗體標記後來加上。

社會最近討論選舉票站調查，當中最重要的部份，就是政府應否加強監管票站調查的問題。

提出監管的一方，指出有些政黨過去曾經進行大規模的票站調查，一方面假借學術研究之名，以不誠實手法向選民套取資料，用作選舉工程。另一方面，又沒有把天文數字的調查經費誠實上報。因此，有關人士建議政府只容許學術機構進行票站調查，又或者把可用作票站調查的票站數目收細，減少票站調查的應用價值。

本人其實非常明白箇中建議的邏輯，亦對過往堅持循規蹈矩的人士表示敬意。不過，本人認為，在基於學術自由和資訊自由的前提下，所有針對票站調查以至一般民意調查的規管，都應該根據三項原則制訂：

- 第一：政府的監管愈少愈好；
- 第二：資訊流通愈暢順愈好；
- 第三：專業守則愈早制訂愈好。

十分多謝議員和社會人士的信任，建議政府容許學術機構進行票站調查。不過，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與其人人不准做調查，不如人人都可以做調查，這才符合香港的核心價值。

根據現時的選舉指引，任何機構如果在投票結束前，公布票站調查中有關選舉結果的預測，便會受到選管會譴責，但指引沒有說明調查機構可否把票站調查結果向候選人披露，用作選舉工程。選管會現階段需要做的，就是在選舉指引中明確說明，如果票站調查機構在投票結束前，向候選人或其代理人披露票站調查資料，是否屬於違反選舉指引，已經非常足夠。

如果有關行為是違反指引，舉證責任大可交給投訴人士，然後由選管會裁決。

如果有關行為並不違反指引，本人就會呼籲所有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在選舉日把所有資料，同時提供給所有參選人士，令到選舉更加公平，資訊更加流通。如果情況真是這樣的話，本人非常樂意與所有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分享票站調查數據，和交流調查心得。以前種種，大可一筆勾銷。

長遠來說，香港媒介和調查業界一定要制定一套民意調查專業守則，由業界自己規管調查的操作和報導。這樣，香港才可以在自由和法治基礎之上，繼續在華人社會中保持優勢。

「票站調查系列——票站調查的專業操守」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鍾庭耀

註：本文刊於由香港電台出版之「傳媒透視」2008年9月號，粗體標記後來加上。

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不少評論認為各方得失與配票有關。可以預期，當分區直選的議席數目繼續增加，而選舉制度繼續採用五區比例代表制最高餘額法分配議席，配票活動只會有增無減，策略投票將會愈演愈烈，選民投票會漸次偏離簡單表態的原則。

筆者無意在此討論棄保效應與配票活動是否健康，這是制度的問題。筆者更加關心民主選舉制度的配套機制，尤其是傳媒操守和民調機制的發展。

近日，在有關票站調查的討論中，不少評論都認為由筆者主持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無須改變往日的處理方法。此外，基於不確的報導和錯誤的理解，不少市民都以為民研計劃會在投票結束前公佈票站調查結果，「報復」選舉管理委員會監察不力。這些誤解，非三言兩語可以澄清。如今選舉過後，筆者可與讀者平心靜氣探討票站調查的問題和出路，集思廣益，為四年後的選舉作出準備。

首先要澄清的，是票站調查的專業操守，近年來已經每況愈下，情況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筆者所指的，並非使用票站調查資料的問題，而是專業操守的問題。

2008年5月12日，筆者在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左右紅藍綠」中說道：「票站調查早在1991年已經引入香港，而政黨比較有系統地使用票站調查作為選舉工程，在1993年王屋區議會補選中已經出現。1995年，學者蔡子強已經在其著作中指出，有政治團體在選舉中大量使用票站調查。政黨使用票站調查進行選舉工程，在政圈中已經是公開秘密。近年不同的，是這些調查開始全面企業化和科技化，但就沒有相應透明化，於是觸發有關調查應否納入選舉經費？選民有否受到誤導？等比較嚴重的問題。」筆者在2008年3月13日，向立法會秘書處，以書面詳細描述了有關發展。筆者又在2008年4月10日，親自向選管會呈交兼口頭陳述有關情況。

所謂票站調查專業操守的問題，是指訪員沒有尊重被訪者的知情權，隱瞞調查的目的，或以自己的學生身份誤導選民，甚至是冒充政府人員或其他機構的訪員，套取選民的投票意向。此外，一些調查機構完全沒有抽樣的概念，一則妨礙其他調查機構的操作，二則對選民構成不必要的滋擾。試想象，如果每個票站外都有三、四個不專業的調查機構在操作，每個機構又派出三、四名訪員「大包圍」所有選民，情況會是怎樣？過去多年，加入票站調查的機構愈來愈多，中學有、大學有、政黨有、社區組織也有。在某些選舉某些關鍵票站，訪問員加上督導員的數目，比同期進出票站的選民還要多。

這類不專業的調查操作，除了窒礙專業調查的發展外，亦直接迫使市民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不答或亂答訪員。就算是比較合作的市民，很多都以為重複一次他們的投票選擇便可免疫，速步離開。殊不知，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投票選項只是其中一個研究課題。如果沒有其他選項

連結分析，研究價值不會很大。

附表顯示，以回歸後主要選舉計，民研計劃的票站調查回應比率，有持續下跌的趨勢。1998 年第一屆特區立法會選舉，以至 2000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期間，回應率大概都在七八成之間。之後，回應率下跌，2004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時的回應率不足七成，今年的回應率更加不足五成。

如果今年的不足五成回應率是因為票站調查的公開爭議所致，那末，2000 年開始的連續下跌，又怎樣解釋？票站調查專業操守沒落的問題，是筆者最關心的問題，與配票和選舉工程無關。

數表：回歸後主要票站調查回應率走勢

	1998 立 會換屆	1999 區 會換屆	2000 立 會換屆	2000 立 會補選	2003 區 會換屆	2004 立 會換屆	2007 區 會換屆	2007 立 會補選	2008 立 會換屆*
日期	24.5.98	28.11.99	10.9.00	10.12.00	23.11.03	12.9.04	18.11.08	2.12.07	7.9.08
全部完成	8,713	6,049	8,426	634	4,550	9,223	1,834	3,424	9,498
部份完成	362	255	245	31	373	998	261	1,476	2,030
拒絕訪問	3,385	1,882	2,862	143	1,370	3,611	755	221	7,642
合計	12,460	8,186	11,533	808	6,293	13,832	2,850	5,121	19,170
回應比率	69.9%	73.9%	73.1%	78.5%	72.3%	66.7%	64.4%	66.9%	49.5%

*此乃初步統計數字

另外一個與選舉工程完全無關的問題，是傳媒操守的問題，亦是在今年所謂「票站調查風波」中，不少評論冠給筆者莫須有罪名的問題。

筆者於 2008 年 4 月 10 日，向選管會的口頭及書面陳述中，包括以下意見：

「基於維護學術自由和資訊自由的前提下，本人希望所有針對票站調查以至一般民意調查的規管，應該根據下列原則制訂：(1) 政府愈少監管愈好；(2) 資訊流通愈暢順愈好；(3) 專業守則愈早制訂愈好……本人同意選管會對『傳媒及各有關機構』在『進行』、『公布』和『廣播』票站調查時，保持自律，並在得悉任何機構違反有關指引時，『發表公開聲明對其作出嚴厲譴責或譴責』……不過，在行駛『譴責』權力的同時，選管會應該明確界定何謂『公布票站調查結果』……即候選人利用政府批准在『禁止拉票區』內進行的票站調查，作為選舉當日選舉工程的重要部份。本人建議，選管會在票站調查指引中明確說明，有關行為有否違反選舉指引，而會招致選管會『嚴厲譴責或譴責』……倘若選管會確認有關活動是符合指引，則可以預期，以選舉工程為主的票站調查數目和規模都會不斷增加，而在民意調查專業守則尚未確立之前，有關調查的操作和質素會更加良莠不齊。此外，倘若有關活動沒有違反指引，本人會考慮修改以往與委託票站調查機構達成的協議，不再過問它們會否把調查資料，全日提供給其他人士。事實上，如果傳媒或研究機構會把票站調查的資料，同時提供給所有參選人士的話，選舉可能會變得更加公平，資訊會更加流通地成為社會公器。」

事情的發展是，筆者的確修改了與合作傳媒的資料發放安排，但只是關乎內部資料傳送的時間安排，其他細節沒有改動，亦沒有鼓勵傳媒挑戰選舉指引。

倘若傳媒日後基於資訊自由和公平資訊流通原則與政府磋商，甚至挑戰政府，是傳媒的

事。今年肯定不會，因為所有贊助票站調查的傳媒都與民研計劃合作多年，新聞主管亦君子承諾不會向外界泄密。市民不信任這些承諾，質疑這個改變，筆者亦沒有辦法，亦一時說不清楚。

筆者會日後再討論這個問題，但就先在此提出一個反問：環顧世界，立法管制傳媒不得在投票結束前公佈票站調查結果者有，單單訴諸傳媒專業操守者也有，完全禁止票站調查者也有。那些國家、那些地區，會禁止委託或執行票站調查的傳媒機構，在什麼時間之前不能取得票站調查的資料，按照自己的需要作出內部分析？我們憑什麼理據，去規管香港傳媒的內部操作？

「票站調查系列——票站調查的海外經驗」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鍾庭耀

註：本文刊於由香港電台出版之「傳媒透視」2008年10月號，粗體標記後來加上。

筆者在本系列文章「票站調查的專業操守」中提出一個問題：環顧世界，立法管制傳媒不得在投票結束前公佈票站調查結果者有，單單訴諸傳媒專業操守者也有，完全禁止票站調查者也有。那些國家、那些地區，會禁止委託或執行票站調查的傳媒機構，在什麼時間之前不能取得票站調查的資料，按照自己的需要作出內部分析？我們憑什麼理據，去規管香港傳媒的內部操作？

所謂「環顧世界」、「海外經驗」，當然只屬參考，不一定適用於本地或其他華人社會。不過，香港既然要成為「亞洲的國際城市」，當我們遇到疑難的時候，參考一下外國經驗亦未嘗不可。尤其是，當我們發現香港的運作是獨一無二時，我們也許要問：是我們得天獨厚？還是因為我們是井底之蛙？

立法會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應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要求，在今年初就海外地方進行票站調查的經驗進行研究，重點七項：

1. 計劃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或機構是否須向選舉規管當局提交申請或聲明；
2. 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或機構是否須符合任何資格規定，尤其是否准許候選人和政黨進行票站調查；
3. 是否准許在所有投票站進行票站調查；
4. 有否就進行票站調查的事宜訂立規例或指引；
5. 在投票結束前，可否向候選人或政黨提供票站調查的結果，讓候選人或政黨使用；若然，是否把進行票站調查的開支計算為有關候選人或政黨的選舉開支；
6. 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或機構是否須就票站調查的結果和調查結果的用途，向選舉規管當局提交報告；及
7. 如任何人士或機構違反有關進行票站調查和使用票站調查結果的規例或指引，會向有關人士或機構採取甚麼行動。

立法會研究部於是選定了六個地方進行研究，包括加拿大、英國、美國紐約州、澳洲維多利亞省、新加坡和新西蘭。有關報告於2008年3月17日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中討論。報告首先說明，由於新西蘭禁止票站調查，而新加坡亦對票站調查有嚴厲限制，因此，及後有關票站調查管制事宜，只能以英、美、加、澳四地，與香港作出比較。

篇幅所限，筆者不打算在本文詳細討論有關研究的結果。整體而論，報告的結論是英、美、加、澳四地對票站調查的管制都十分寬鬆，除了在公佈票站調查結果的時間上，通常有所限制外，一般都沒有太多規管。

不過，筆者需要指出兩點：

- (一) 有關研究未有探究英、美、加、澳四地在法例以外的專業規管。
- (二) 有關國家所有關於票站調查的管制，全部都是針對傳媒的運作，亦假設只有傳媒機構進行票站調查。

筆者指出以上兩點，並非否定有關研究的價值，而是希望本港社會在進一步討論票站調查發展的時候，能夠補充有關研究的不足。事實上，單單透過法律條文研究英、美、加、澳四地，而美、澳的研究又只集中於一州一省，或多或少有所限制。但無論如何，筆者開宗明義提出的問題：「那些國家會禁止傳媒機構在什麼時間取得票站調查資料？」恐怕還是沒有答案。

道理其實並不難明。在英、美、加、澳，以至其他民主社會，進行票站調查者就是傳媒機構。一些國家，例如美國，傳媒競爭激烈，傳媒機構大多不願合作進行票站調查，共享資料。不過，由於進行票站調查的經費實在太過龐大，傳媒機構也只好合組公司進行票站調查，資源共享，數據共用。在這種情況下，電子傳媒的競爭，不在於數據的擁有，而是在於數據的靈活運用。選舉當日，電子傳媒各自排出評論陣勢，當中包括統計師、分析員、圖表設計師、網頁控制員，全部第一時間以觀眾明白的方法解釋票站調查的結果，和勝負的奧秘。電子傳媒的新聞主管全天監察票站調查的數據，並在投票結束時，各自裁決某某州郡的選舉預測。電子傳媒的競爭，並不在於使用不同數據，而是在於選擇什麼統計模式，研判「勝負」，或宣佈「機會均等」。

香港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出現了贊助傳媒什麼時候可以拿取票站調查數據的問題，是一個傳媒內部操作的問題，是一個完全與國際社會脫節的問題。原來我們的傳媒是這麼樣不值得信賴，原來我們沒有獨立的傳媒。那麼，立例規管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筆者有幸獲得立法會研究部的邀請，就本港發展票站調查表達意見。研究部的報告書中第1.4段記述如下：

政制事務委員會在2008年2月18日的會議上，要求研究部查詢本地進行民意調查的人士或機構對香港現行有關票站調查安排的意見。研究部曾發信詢問本地大學進行民意調查的主要人士或機構。截至本資料摘要發表為止，研究部收到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鍾庭耀博士的意見書。在其意見書3中，鍾博士認為任何人士或機構(包括候選人和政黨)均可進行票站調查，前提是有關人士或機構會"承諾遵守切合本地情況的《世界民意研究學會票站調查和選舉預測指引》(The WAPOR Guidelines for Exit Polls and Election Forecasts)[將於2.2段載述]修訂版本"，並"承諾不把有關數據用於選舉當天的競選工作"。他鼓勵傳媒及各有關機構在使用有關資料時"自願承諾遵守世界民意研究學會的有關標準"。此外，他認為選舉管理委員會(下稱"選管會")呼籲傳媒及有關機構應待投票結束後才公布票站調查結果，以及選管會就任何沒有遵守有關指引的機構，以發表公開聲明譴責或嚴厲譴責有關機構這一貫做法，"在過去16年行之有效"。

立法會研究部的報告書中，除了羅列英、美、加、澳四地的情況外，其實亦花了頗多篇幅討論「國際性民意調查組織就票站調查發出的指引」。例如，報告書中提及：「世界民意研究學會和世界民意及市場研究專業人員協會原則上反對規管民意調查的進行和匯報。然而，在選舉投票完全結束前，不應根據票站調查就選舉結果公布任何陳述」，及「指引亦訂明，"讓公眾查閱的票站調查應公平公正，不偏袒任何黨派"，該些調查"不是為黨派造勢的工具"」。

有關報告書對票站調查的討論其實已經相當全面，只是在後來的立法會討論和選管會的諮詢中，專業操守的問題已被政治利益掩蓋。傳媒的內部操作與政黨的選舉工程相提並論，才引至誤會重重，讓理性討論落後於政治形勢。

這個錯誤，不可一，不可再。

參考資料：本文資料大量引自立法會秘書處文件《選定地方對票站調查的規管》，可從下列網址下載：<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sec/library/0708in10-c.pdf>

「票站調查系列——美國總統選舉票站調查」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鍾庭耀

註：本文刊於由香港電台出版之「傳媒透視」2008年11月號，粗體標記後來加上。

美國總統選舉牽動了世界傳媒，除了因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外，還因為美國傳媒報導選舉的方法帶領潮流，不少世界各地以「第四權」自詡的新聞媒體，都趨之若鶩。

美國傳媒在選舉期間大量引用選前和票站調查的數據，以第一時間立體報導選舉預測和選情分析，受惠者不單是美國人民，就連國外受眾，包括香港市民，亦可第一時間掌握選情，既可享受資訊自由，又可增加世人對美國選舉制度的認識，發揮極大公關作用。

筆者以前提及，立法會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曾經應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要求，就海外地方進行票站調查的經驗進行研究，協助立法會討論票站調查在本地的發展。筆者指出，有關研究著重法律條文，有所不足。剛剛結束的美國總統選舉，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筆者在選舉前向本地傳媒發放了一份通告，建議傳媒在採訪美國總統選舉時，可以考慮下列課題：美國傳媒如何進行和使用票站調查？在什麼時候拿到票站調查數據？什麼時候公佈選舉預測？如何處理東西岸時差？如何在資訊自由和選舉公平之間作出平衡？在投票日前公佈提早投票調查結果會否影響選舉公平？等等。本文集中討論選舉預測所引申的問題。

美國總統選舉於11月4日進行，除了新罕布爾州（New Hampshire）兩個小鎮外，以香港時間計，美國東岸最早開始投票時間是11月4日黃昏時分，最早截止投票時間是香港時間11月5日早上8時。阿拉斯加（Alaska）是最後截止投票的州份，在香港時間翌日下午2時結束。

與過去幾屆選舉一樣，筆者都有詳細觀察美國傳媒的票站調查。今年的觀察範圍包括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電視直播和網上廣播、美國廣播公司（ABC）的電視直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網上廣播、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網上廣播。筆者擴大了觀察範圍，是希望可以更加精準地比較不同傳媒的報導方法。

簡而言之，美國傳媒今年報導票站調查的方法，跟過去並無顯著分別。不過，在宣佈個別州份的結果時，就比以前謹慎，兼且使用了比較含糊的字眼。例如，傳媒以前的預測主要引用票站調查數據，以「可以勝出」或「勝算接近」（“call” or “too close to call”）來描述個別州份的推算。近年來，傳媒開始謹慎，如果票站調查的得票差異未能超過既定誤差，傳媒就會押後公佈預測，等待政府公佈部份點票結果後，再結合票站調查數據作出綜合分析，然後宣佈推算結果。不過，在這種運作下，押後公佈就等同「勝算接近」。

今年，傳媒更加謹慎，差不多所有進行票站調查的傳媒，都在節目或網頁內多番解釋，如果傳媒押後公佈某些州份的預測，並不同「勝算接近」，可能只是「資料未夠」（“too early to

call”），避免觀眾認為遲報等於緊湊。不過，觀眾對「邊選邊報」的做法，從來沒有異議，而且是萬眾期待的環節，沒有引來選舉不公的指摘。

美國傳媒的做法，有其歷史原因，亦有過爭拗。篇幅所限，在此不贅。筆者希望指出，在美國傳媒的發展史上，言論和資訊自由，始終排在首位。在今年的總統選舉中，起碼有三點值得香港市民注意：

- (1) 提前投票的效應：美國總統大選提前投票越來越受選民歡迎，2000 年提前有 15%，2004 年有 22%。本屆有 30 多州接受提前投票，全國比率就大幅上升至超過 30%。根據傳媒在選前數天公佈的調查結果，提前投票的選民中，59% 聲稱投了奧巴馬，40% 謂投了麥凱恩。換言之，在正式投票日前，透過民意調查，國民其實可以預知大約三分之一已經投票選民的取向。這個比例，在個別州份可以更高。
- (2) 兩個小鎮的象徵意義：在新罕布爾州，當地時間 11 月 4 日零時，即香港時間同日下午 1 時，兩個小鎮迪克斯維爾山口 (Dixville Notch) 和哈特鎮 (Hart's Location)，率先開始投票。該州法律規定，所有票站須於早上 11 時開始作業，而人口不足百人者，最早可在零時過後開始投票，而當所有登記選民投票完畢後，便可點票。兩個小鎮因此鑽了法律空子，每次投票日零晨左右，便安排所有選民同步投票。每鎮選民人數不足 30 人，每人一個劃票區，數分鐘內完成作業，隨即點票。今屆投票結果是，奧巴馬在迪鎮及哈鎮分別以 15 對 6 票和 17 對 10 票取勝。選票數目當然是九牛一毛，但世界傳媒爭相報導兩個小鎮的投票結果，性質上與報導全國提前投票的統計數字，其實沒有分別。美國人非常受落，香港人亦沒有半點批評。
- (3) 美國傳媒隨著個別州份截止投票，便第一時間判斷有關州份是否勝負分明。如果個別候選人在東部大勝，傳媒隨時宣佈勝負已分，不會等待全國投票結束。今次選舉，由於部份東部和中部的州份「資料未夠」，所以最後勝負要待西岸四個州份截止投票後始能研判。當時是香港時間 11 月 5 日中午 12 時，比阿拉斯加州截止投票時間早兩小時。美國人和香港人也欣然接受。

上述三點，足見美國傳媒如何平衡資訊自由和選舉公平的原則。大選期間，本地傳媒鋪天蓋地般報導了民主共和兩黨的選舉工程和選情分析。選舉過後，香港傳媒大量轉載美國傳媒票站調查的數字，分析勝敗原因和選後形勢，但卻完全沒有總結美國票站調查經驗，是否值得香港借鏡。

筆者估計，本地傳媒其實十分重視美國傳媒的票站調查和資訊自由。不明所以者，是為什麼本地的學者專家，以至政界中人，當面對本地傳媒如何處理票站調查時，會變得異常苛刻，兼且沒有信任。是否雙重標準？

保守人士認為民調數字，尤其是票站調查預測，可以影響選情所以造成不公，只是其中一方論據。資訊自由和傳媒責任，其實應該一併考慮。新聞從業是持份者，學者專家是引路人，為什麼我們不好好討論美國票站調查的制度，集思廣益？

香港被譽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又要超英趕美，難道我們不配擁有敢於維護資訊自由的電子傳媒和調查機構嗎？

「票站調查系列——選管會報告書引申的問題」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

註：本文刊於由香港電台出版之「傳媒透視」2009年1月號，粗體標記後來加上。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四日，選舉管理委員會（下稱「選管會」）向行政長官呈交《在二〇〇八年九月七日舉行的二〇〇八年立法會選舉報告書》（下稱「報告書」）。政府在五天後向公眾發表報告書，並謂「會與選管會緊密合作，在考慮社會人士所提的意見後，跟進報告書內的建議。」

報告書的中文版本全文共有十六章。撇除十三個附錄部份，報告書提及「票站調查」的地方共有五處十九次，主要是關於指引的修改過程，投訴過案和檢討總結。

報告發表後，傳媒的報導相當零碎，大概只有半數報章報導，但篇幅並不顯著。針對票站調查的報導，亦觀點各異。《信報》、《明報》、《東方日報》和《太陽報》，提及泛民批評選管會縱容團體濫用票站調查進行配票，而《大公報》、《明報》和《新報》，就提到選管會「不點名提及」筆者曾建議「提前宣布調查結果」。

為了忠於原著，筆者在此節錄報告書的第十四章「檢討及建議」的第三節，讓讀者參考：

14.12 選管會在指引公布前後均接獲公眾意見，指不應允許在投票結束前發放票站調查結果作拉票用途，因為此舉可能影響選舉結果。選管會認為，選舉指引第 15.4 段已充分回應這方面的問題。

〔筆者註：選舉指引第 15.4 段全文為：在投票時間內公布的任何票站調查結果或意向預測，尤其是關於個別候選人或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均可能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及選舉結果。因此，選管會提醒傳媒及有關機構，在投票結束前，不可公布票站調查結果或就個別候選人或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的表現發表具體評論或預測。[2008 年 7 月修訂]〕

14.13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日，一個有意在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向傳媒宣布，會在投票當日由晚上九時提前到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向傳媒贊助商發放票站調查結果。該機構擬作出的行動引起社會關注，因過早透露票站調查結果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部分候選人公開促請選民不要回應票站調查。

14.14 鑑於各界對進行票站調查的關注，選管會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二日發出公開聲明，強調選管會十分重視確保所有公共選舉在公開、公平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而且會密切監察投票日的選舉情況。此外，選管會亦會提醒傳媒和調查機構，無論何時均須遵守選舉指引。

14.15 二零零八年九月三日，上述機構宣布只會在投票日晚上八時（而非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向傳媒贊助機構發放票站調查結果。

建議：

14.16 選管會將會繼續聽取與票站調查有關的意見，並在下次換屆選舉前，與其他選舉安排一併在選舉指引中作出考慮。

以邏輯推理，14.12 至 14.15 段的文字可能只是選管會按照時間敘述，而無因果關係。不過，以常理判斷，又隱隱現暗示倘若筆者「在投票當日由晚上九時提前到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向傳媒贊助商發放票站調查結果」，會導致「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的結果，引至「部分候選人公開促請選民不要回應票站調查」，因此，「選管會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二日發出公開聲明……提醒傳媒和調查機構，無論何時均須遵守選舉指引」，筆者於是在翌日「宣布只會在投票日晚上八時（而非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向傳媒贊助機構發放票站調查結果」。

上述「常理判斷」，是否選管會的原意，筆者不得而知，但報告書沒有說明「部分候選人」（其實是泛民候選人），其實是針對選管會沒有回應團體濫用票站調查的問題，而要求選民杯轆所有票站調查。報告的陳述並不全面。況且，如果筆者在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向傳媒贊助商發放票站調查結果」屬於違規，為什麼晚上九時「發放」就不違規？

事實上，選管會是否打算處理選舉工程票站調查的問題，選管會自己也沒有說清楚。筆者覺得前任中央政策組顧問、現任《信報》主筆練乙錚最有見地。練乙錚於 2008 年 9 月 2 日在《信報》發表「天堂仙境中的當權派配票行為」，文中寫道：

策略性選舉行為是理性行為的一種，本身無所謂好壞……近年香港有某政黨被指在投票當日進行密集而廣泛的票站出口調查……這種行為本身並無不妥，但如果不是每一個政黨都有同等的人力、組織力和金錢資源去進行這種票站調查和配票，則牽涉到公平問題。遇有這種不公，政府的確應該採取行動禁止，但香港的情況特別，被指進行上述不公平策略行為的政黨是當權派之一的民建聯，特區政府當然不願出手禁制……鍾先生曾數度為文指出民建聯的做法不公，並曾在今年四月五日的一封〈香港家書〉中表明，如果政府最終不願有效遏止這種不公，研究機構和傳媒應在不違反選舉規例的情況下，向全社會發放實時票站出口統計結果，讓所有候選人及時公平享有關鍵形勢資訊。故對上周六的鍾庭耀聲明，政界中人並不感到意外。不過，這個做法能夠替整個選舉還原多少公平，則很難說……

筆者完全明白，當時有些社會人士希望把選舉工程票站調查的爭議，轉移視線到筆者與贊助傳媒機構的工作流程上。但作為監管選舉的最高獨立機構，選管會應該有自己的獨立判斷。筆者於 2008 年 4 月 10 日，向選管會的口頭及書面陳述中，包括以下意見：「本人注意到，截至目前為止，負責政制事務的主要官員，始終沒有清楚說明〔把票站調查用作選舉工程〕是否違反指引。作為由行政長官委任的獨立委員會，選管會應該以公平公開的態度，審視有關問題，對症下藥。」

2008 年 5 月 12 日，筆者在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左右紅藍綠」中自問：「為什麼有關討論只是集中在泛民議員和林瑞麟局長之間？」然後自答：「與鄰近地區比較，香港的選舉算是比較文明和乾淨，因為香港的法治制度比較完善，行政機關比較中立。在過去 15 年，香港選舉的重要事務，都是由最高權力委任的獨立委員會負責。因此，當議員追問局長會否監管票站調查時，局長應該說交由選管會處理便可。選管會由特首任命，主席必定是法官，兼且要先諮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後才任命，代表香港的法治精神，公信力應該不錯。」

可惜，報告書發表後，在 12 月 15 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中，選管會主席沒有現

身，往後亦沒有跟進議員的提問。差不多所有關於報告書的提問，都是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代答，間中由總選舉事務主任補充。選管會的超然地位，已悄然被政治任命的局長和其統領的行政官員取代。

筆者無意對選管會主席彭鍵基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不敬。事實上，筆者歷年來都與選管會和選舉事務處合作愉快。就算是林瑞麟局長，筆者亦深切明白其職位與言論的關係。筆者多次提及選管會獨立性的問題，是希望有關人士明白，選管會是香港法治精神的一部份，而法治與政治之間，須要獨立分工。

報告書提到選管會將繼續聽取意見，在下次換屆選舉前，把票站調查和其他選舉安排一併考慮，是一個可嘉的結論。但願選管會日後的考慮，能夠更加全面，更加獨立。

香港電台「傳媒透視」稿件 2009 年 3 月 9 日

票站調查系列——票站調查研討會後記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

註：本文已投交香港電台出版之「傳媒透視」，將在 2009 年 3 月號刊登，粗體標記後來加上。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日，民主動力與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計劃，在城市大學聯合舉辦了一個票站調查研討會，討論去年立法會選舉時出現的票站調查問題，和展望票站調查日後的發展。出席人士包括學者專家和政團代表。之後，部份報章作了簡單報導，但標題和重點則大異奇趣。

《新報》翌日以「泛民促禁票站調查不滿被用作配票、矛頭直指選管會」為題，以較長篇幅報導了部份與會者的論點：

何秀蘭及湯家驊在會上表示……選管會應規範進行調查機構全面公開票站調查結果，又或全面禁止票站調查……馬嶽則表示，選管會應堅持兩個立場，一是以票站調查作配票應在選舉開支上申報，若不申報就應當刑事罪行；二是調查員若向被訪者表示調查是作學術研究，不向外公布，就當作失實聲明……鄭宇碩指，票站調查的學術價值非常低，主流學術期刊亦甚少會看到以票站調查佐證的文章。王家英亦稱主流學術界很難單以票站調查分析選舉行為……鍾庭耀則反駁，「票站調查結果用於選舉工程是常識」，只是以往以調查來配票的人沒有現今的明目張膽。他亦指票站調查能探討投票行為及支援學術研究，並不是沒有學術價值……蔡耀昌表示，他們早前發信邀請包括民建聯、自由黨在內的各個政黨，及在選舉期間舉行票站調查的六個機構出席論壇，但昨日只有鍾庭耀、香港調查研究中心代表及泛民代表到場。

《文匯報》同日就以「學者批反對派：阻票站調查礙民主發展」為題，有以下報導：

湯家驊稱自他們呼籲選民杯葛調查……證明「有效」，故會繼續要求選民杯葛此類調查……鍾庭耀指，反對派要求限制民調的做法，不利於香港民主的長遠發展。香港調查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文濤亦呼籲，市民應尊重票站調查的必要性，包括其學術性及科學性等，不應將之過分政治化……王家英則指，票站調查的成就價值包括市場、新聞、學術及政治價值……馬嶽亦指，反對派建議只准「學術機構」於投票日進行票站調查，此舉很「奇怪」，等於「港人自己在剝削自己的公民權力」。

《明報》同日就以「鍾庭耀：票站調查資訊不應封殺」為題，報導比較簡單：

鍾庭耀在研討會上強調，當日改變與贊助傳媒合作的方式並沒有錯，即使傳媒洩漏資訊，也非機構的問題，並指寧願票站調查的資訊全面流通，都較全面封殺票站調查為佳……劉慧卿表示……問題是有人會私下公布結果，幫助候選人配票……湯家驊認為，既不能監

管，民主派只能繼續呼籲選民不回應調查……王家英認為，票站調查的規管應愈少愈好……譚志強表示，香港應效法台灣、澳門，禁止在選舉當日作任何票站調查……

《星島日報》同日就以「論票站調查鍾庭耀遭圍攻」為題，報導更加簡單：

王家英直指，不可能透過票站調查看到選民的選舉行為，學術價值非常少……馬嶽認為，可將候選人就票站調查發出失實聲明，及沒將調查費用納入選舉開支的罪行刑事化。鍾庭耀就強調，自己一向「守住一條綫」，不會在選舉期間對外透露調查結果……

《蘋果日報》同日就以八卦政治新聞形式，以「隱形左派現真身」為題，簡略報導如下：

泛民嘢日搞咗個研討會講票站調查……被指屬左派組織嘅香港調查研究中心代表吳文濤願意出席……講到錢呢個問題，呢位吳生就答到口啞啞……至於啲票站調查資料，佢就話絕對冇畀人用嚟配票，全部都鎖晒喺個櫃入面㗎。

評論員李慧玲，就兩天後在《am730》以「神秘機構現身」為題，評論事件：

出乎意料，香港調查研究中心竟然派代表出席……中心代表在研究會否認調查與選舉工程有關，還笑著回應：「如果係有，我就唔嚟啦！」……中心曾聘請樹仁學生做票站調查員，不過負責的導師告訴我，中心只要求樹仁做訪問，最重要的數據分析研究，就不在他們工作之內。研討會完畢，中心如何運用數據仍舊是個謎，如果現行規管制度不變，選民只好牢記神父的教誨：我投江自盡。

上述節錄顯示，基於不同背景和取向，不同報章用了不同觀點報導當天的討論。作為與會講者之一，筆者覺得上述所有文章的總和，都未能全面反映研討會當日的討論。筆者希望透過本文作出一些補充和評論。

首先，部份與會人士認為票站調查的學術價值低，似乎忽略了國際學術期刊和學術著作中，無數討論票站調查方法和制度、以及直接使用票站調查數據的論文。筆者日後會詳細討論這點。其次，與會人士多次質疑香港調查研究中心曾否把票站調查資料用作選舉工程。中心代表吳文濤都明確否認。可能筆者的想法比較簡單，筆者選擇相信吳文濤，在其工作和認知範圍內，沒有參與選舉工程。

研討會當日，主辦機構民主動力派發了一份文件，題為「2008 年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機構分析」，節錄如下：

去年立法會選舉，選舉事務處在距離投票開始前約 36 小時，才把 6 間獲准進行票站調查機構的資料，包括機構名稱和調查員姓名上載到網站，供公眾查閱。該六間機構分別為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香港研究協會、香港社區研究中心、香港調查研究中心、社區研究協會、以及萬國宣道浸信會盛恩基督教社會服務中心。

立法會選舉當日，全港共設 532 個票站，進行票站調查的 6 間機構中，以香港研究協會的規模最大，在全港近四成共 198 個票站派出調查員……香港社區研究中心……專注於新界西選情；社區研究協會……專注於新界西東選情；香港調查研究中心則〔在〕港島區……

香港研究協會、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香港調查研究中心三間機構在投票結束後，均有在其

網站公佈票站調查結果及作出分析。其餘機構都未見有公佈票站調查的結果。

六個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中，最少四個是具有親北京背景或屬左派陣營……〔論據從略〕

上述文件還有兩個附表，詳述六間票站調查機構的背景，及民主派跟進票站調查行動的序列。文件明確顯示，民主派在選舉前舉行記者會，呼籲選民拒絕向票站調查機構披露投票意向，是針對選舉管理委員會對票站調查規管不善，讓票站調查「淪為一些有財有勢的政治力量進行選舉工程的工具」。

研討會結束前，筆者曾經作出以下發言（大意或原意）：香港調查研究中心派出研究員吳文濤出席是次研討會，值得嘉許。各界人仕對票站調查的發展有不同意見，份屬正常，亦包含很多歷史原因。作為兩岸四地華人社會的典範，香港如果能夠參考國際社會的經驗，在符合學術自由、資訊自由和專業操守的前提下，發展出一套完善的票站調查制度，對華人社會的發展有深遠的意義。

位處本地政治光譜中不同位置的各方人仕，如果能夠開心見誠，集思廣益，甚至既往不究，或許能夠覓得一條出路。

WAPOR Guidelines for Exit Polls and Election Forecasts

Guidelines for Exit Polls and Election Forecasts issued by World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WAPOR), 10 December 2006

*Note: Key passages most relevant to Hong Kong have been highlighted in **bold** by Robert Chung, who was WAPOR's Secretary-Treasurer between 2006-07.*

Written by WAPOR Exit Poll Committee
Approved by WAPOR Council, 10/12/2006

Public opinion is a critical force in shaping and transforming society. Properly conducted and disseminated, survey research provides the public with information from the measurement of opinions and attitudes and allows its voices to be heard. This document provides guidelines for conducting exit polls and making election forecasts on election days.

EVALUATING EXIT POLLS AND ELECTION FORECASTS

Exit polls are polls of voters, interviewed after they have voted, and no later than election day. They may include the interviewing before election day of postal, absentee and other early voters. In some countries election day polls cannot be conducted at the polling place, but in most cases, interviewing takes place at the polling location.

Exit polls can serve three different functions that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predicting election results; describing patterns of voter support for parties, candidates, and issues; and supporting extensive academic research efforts.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may be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 results are formulated and disseminated.

Exit polls used for projections should be reported as soon after the polls close as practical. Any delay in disseminating the results will inevitably raise questions about the legitimacy of the effort,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estimating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 If analysis is the only purpose of the exit poll, prompt release is less important.

In some countries, election laws prohibit the publication of exit poll data until after the polls have closed. **WAPOR and ESOMAR oppose regulation of the conduct and reporting of polls in principle. However, no statement about the outcome of an election based on exit polls should be published before all the polls in the contest have closed. In national elections, this means polls relating to election results for elections in smaller voting units can be reported when all the polling places have closed in those locations, rather than waiting until all polling places used for voting that day have closed.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other than voting behaviour may be published before the polls have closed.**

ETHICAL PRINCIPLES

Survey researchers in general and those conducting exit polls in particular need to follow certain broad principles in conducting their research:

1. **Exit polls conducted for public consumption should be impartial and non-partisan. Exit polls are scientific research designed to collect data and report information on electoral outcomes. They are not tools for partisan advocacy.**
2. **Methods should be transparent, public, and well-documented.** These goals can be achieved by publicly describing the methods prior to conducting the exit poll and by **adhering to the standards of minimal disclosure** delineated in this document. It is also recommended that when the exit poll is used for analysis, the data set (without individual identifiers) along with appropriate survey documentation be deposited in public archives and/or on web sites for general access.
3. Data collectors must adopt study designs for their exit polls that are suitable for producing accurate and reliable results and that follow specific procedural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stipulated in this document.
4. When reporting results from exit polls, data collectors and analysts must be careful to keep their interpretations and statements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data. Speculation and commentary should not be labeled as data-based reporting. Limitations and weaknesses in the design of an exit poll, its execution, and the results must be noted in all reports and analysis. **Results should be released to the public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through the general media and simultaneously made accessible to all.**
5. The identity of respondents in exit polls must be protected. No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e.g. name, address, or other IDs) should be maintained with the voter-level records, and the data set should not allow deductive disclosure of respondents' identity. To limit the chances of deductive disclosure, small-area geographic details such as the specific polling place in which votes were cast should not be revealed.

EXIT POLL METHODS AND THEIR DISCLOSURE

Poll methods must be generally accepted as good survey practice and must be disclosed in advance of the conduct of the exit poll, as well as with any projection or analysis or subsequent public release of the dataset.

Items for Minimal Disclosure: These items should be disclosed with any exit poll report or when any projection is made. Good practice would be to disclose as much of the methodology in advance as possible, particularly those items marked with an asterisk, which should be disclosed before Election Day.

***Sponsor of the exit poll**

*Name of the polling company or principal researcher; prior experience (if any) in exit polling; and **whether the data collector has any business or personal ties to political parties, candidates,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or governmental bodies.**

*Name of the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analysis and projections, if different.

Number of interviews

*Number of sampling points

*Sampling frame

*Geographic dispersion and coverage

*How sampling points are selected

*Where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at polling places, in person at homes, by phone, etc.

*Any legal limits on data collection that might affect polling accuracy (e.g., minimum distance of interviewers from the polling place)

Time of day of interviewing

Whether interviewers are part of a permanent field staff or hired for the occasion

*How respondent anonymity is guaranteed (paper questionnaires, etc.)

The interview schedule or questionnaire and instructions

Which results are based on parts of the sample, rather than the whole sample

A description of the precision of the findings, including estimates of sampling error

Monitoring and validation procedures (if any)

Weighting procedures

Response rates (using one of the definitions in the AAPOR/WAPOR “**Standard Definitions: Final Dispositions of Case Codes and Outcome Rates for Surveys**”) and item non-response on vote questions

Any known nonresponse bias

General description of how estimates are made and the kinds of variables that are being used, and whether adjustments for nonresponse have been made

Known design effects

Political parties may sometimes make claims about private data. These claims also require documentation. Any public statement referring to exit poll results should abide by these disclosure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Good Practices: Those conducting exit polls should always use generally accepted scientific methods. However, there are a number of good practices that apply specifically to exit polls.

Exit polls typically employ clustering in their sample designs. Because of the possibilities that various groups might attempt to influence voters and/or exit poll respondents, exit poll researchers are not expected to disclose the actual sample points or locations.

Exit polls should collect information across the whole of the polling day. Probability sampling (or full census) for interviews conducted at the polling place is the only acceptable selection method. Quotas are not appropriate for sampling at the polling place.

A national exit poll should represent the entire country, with 95% of the target population included in the sampling frame. If the sampling frame covers less than 95% of the target population, there should be an explanation for that decision.

Exit pollsters should keep in m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ll units for which the votes are tabulated and that can also serve as clusters for exit poll interviews. One way to evaluate an exit poll is to compare the actual election results and the estimates derived from the exit poll interviews for these same units. This comparison of small unit accuracy, typically at the precinct or polling place level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understand the exit poll's success. But there are situations where this will not be possible, either because no tabulations are reported at the smallest voting unit level or because the sampling units do not coincide with voting units.

ELECTION PROJECTION METHODS AND THEIR DISCLOSURE

Election projections can be made in other ways than by interviewing voters as they exit the polling place. While most projections are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voters after they have voted at a polling place, other forecasting models may include:

- interviews in person, by telephone, or by othe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with voters after or before having cast their votes
- counts of official votes in a sample of precincts, often known as quick counts
- a mix of methods

A projection is an estimate that leads to a conclusion about the outcome of an election in a jurisdiction such as a nation, a state or a district. This may occur in two different situations:

- If the winner is based on the popular vote for an office or a party, then a projection of the division of that vote is a projection of the outcome in the jurisdiction.
- If the winner is based on the vote in multiple jurisdictions, such as election of a Parliament where votes are cast in districts or of a President where votes are accumulated based on victories won in many jurisdictions, a conclusion about which party has a plurality of seats in the new Parliament or which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as a winning number of votes is a national projection.

The projection need not reach a conclusion about each sub-jurisdiction. It need only reach a conclusion about the jurisdiction outcome.

The objective of any projection is a conclusion about an election for some jurisdiction. A sample of that jurisdiction must be adequate to reach an unbiased conclusion with sufficient/appropriate confidence in the estimate. A national projection typically requires the coverage of the entire country, with at least 95% of the target population in the sampling frame.

There will be times that a subset of the country will be used (for example, only competitive districts). But if a sampling frame is used that includes something less than the entire voting population of a jurisdiction then the pollster should define what is and is not included in the sampling frame in a disclosure statement. The pollster also must publish a rationale to justify the pollster's ability to make

an unbiased conclusion about the election outcome based upon collecting information from a subset of all jurisdictions.

WAPOR EXIT POLL COMMITTEE MEMBERS

Chair: Kathleen Frankovic, former WAPOR President, US
Director of Surveys, CBS News

Nick Moon, UK

Director, GfK NOP Social Research

Richard Hilmer, Germany

Managing Director, Infratest dimap

Mahar Mangahas, Philippines

President,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Alejandro Moreno, Mexico

Department of Public Opinion Polling Head, Reforma

Anna Andreenkova, Russia

Co-Director, CESSI

Warren Mitofsky, US (until his death in September)

President, Mitofsky International

Ex officio: Tom Smith, WAPOR Professional Standards Chair

Michael Traugott, WAPOR Vice Presiden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民意研究計劃

Tel 電話：(852) 3921-2700 Fax 傳真：(852) 2517 6951 Website 網址：http://hkupop.hku.hk

Address: 5/F, Kennedy Town Centre, 23 Belcher's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地址：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二十三號堅城中心 5 樓



2008 年 9 月 2 日 關於 2008 年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聲明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今日（2008 年 9 月 2 日）舉行簡報會，向新聞工作者及參選人士解釋今年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的操作詳情。本聲明旨在重申部份比較重要的原則。

- (1) 民研計劃自 1991 年開始便進行選舉票站調查，17 年來從來沒有把有關資料，在選舉結束前向任何參選人士披露或泄露，今年亦不例外。內部操作屢有調整，份屬正常。
- (2) 多年以來，贊助票站調查的傳媒機構都有向民研計劃表示，希望盡早獲得票站的結果預測，部署採訪安排。近年來，民研計劃通常都會在晚上九時左右，向有關機構的最高主管透露有關結果，並叮囑有關人士留意選舉指引的要求。
- (3) 從國際標準看，有關措施其實並不普遍。一般而論，參與或贊助票站調查的傳媒，會全日分析票站調查的數據。至於如何使用有關數據，則屬傳媒操守和法例要求的部份。
- (4) 民研計劃主任鍾庭耀，於 2008 年 4 月 10 日曾經上書並親自向選舉管理委員會解釋有關安排，其在香港的演變過程，及要求選管會明確界定如果任何人士把調查結果用作選舉工程的話，有否違反選舉指引。如果沒有違反選舉指引的話，民研計劃根本毋須對傳媒的內部運作越俎代庖。在選管會及後公佈的選舉指引，完全沒有觸及選舉工程和選舉經費的問題，只重申提醒傳媒不應在選舉結束前公佈票站調查結果，這個問題早在 17 年前已經解決。
- (5) 民研計劃今次放寬對贊助機構的要求，對參選和公眾人士完全沒有影響，完全沒有跡象顯示傳媒今年會提前公佈結果，或向外界披露或泄露有關結果。況且，民研計劃傳送給贊助傳媒的資料，亦只有「機會較高」、「機會較低」等粗糙資料。
- (6) 不過，民研計劃須要強調，傳媒工作者自己有責任維護自己的權益和專業操守。須要加強保密工作的話，民研計劃會積極配合，或另訂資料傳送時間。
- (7) 民研計劃稍為調整與贊助機構的工作關係，便成為公眾的討論焦點，證明社會人士十分關注票站調查的作用。民研計劃希望在今次選舉之後，社會人士能夠就選舉指引的理念和細枝詳細討論，找出共識。
- (8) 民研計劃主任鍾庭耀一向強調，在基於學術自由和資訊自由的前提下，所有針對票站調查以至一般民意調查的規管，都應該根據三項原則制訂：(一) 政府的監管愈少愈好；(二) 資訊流通愈暢順愈好；(三) 專業守則愈早制訂愈好。希望日後的檢討會沿此方向出發。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民意研究計劃

Tel 電話：(852) 3921-2700 Fax 傳真：(852) 2517 6951 Website 網址：http://hkupop.hku.hk

Address: 5/F, Kennedy Town Centre, 23 Belcher's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地址：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二十三號堅城中心 5 樓



2008 年 9 月 3 日

關於 2008 年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聲明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今日就 2008 年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發表以下簡短聲明：

- (1) 本人留意到有部份參選及社會人士，基於憂慮票站調查的資料會用作選舉工程，公開呼籲選民一概不答或亂答票站調查，本人認為此舉會損害公民社會的長線發展，及會為調查研究的專業發展造成傷害，希望有關人士重新考慮。
- (2) 本人認為，只要選民緊記「問、選、記」的原則，已經可以解決問題。「問」是先問明調查背景，「選」是選擇是否作答，而「記」就是記下懷疑事項以便跟進。倘若不肯定有關調查是否違規，就可以直接「問選記」，即向選舉委員會查詢。
- (3) 鑒於部份社會人士擔心民研計劃今年調整與贊助傳媒的安排，會導致資料外泄，民研計劃已經再次與贊助傳媒協商，並達成共識，有關選舉日中午及下午的粗糙選情描述，會押後至晚上八時才交給有關傳媒的主管，作為內部參考。本人認為，有關安排已經達至資料保密、市民放心和方便採訪的目的。
- (4) 本人值此感謝各界人士對我們的關注，並期望選舉過後會通過更加廣泛的討論，對票站調查的發展達至新的共識。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民意研究計劃

Tel 電話：(852) 3921-2700 Fax 傳真：(852) 2517 6951 Website 網址：<http://hkupop.hku.hk>

Address: 5/F, Kennedy Town Centre, 23 Belcher's Street, Kennedy Town, Hong Kong

地址：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二十三號堅城中心 5 樓



2008 年 9 月 5 日 新聞公報

關於 2008 年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安排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已經把 2008 年 9 月 7 日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的票站名單，全部上載到《香港大學民意網站》，網址為<http://hkupop.hku.hk>，歡迎各界查閱。民研計劃一共抽取了 120 個正選票站，及 64 個後備票站，進行票站調查，而所派訪員亦會在每個抽樣票站，按照特定時段和隨機方法抽取選民進行訪問。民研計劃的訪員會一律穿著印有「HKU POP 港大民研」的制服，以茲識別。民研計劃尊重每位市民是否接受訪問的權利，既不會在投票結束前公佈任何有關候選人得失的數字，亦不會把調查數據用作任何選舉工程。任何人士如對民研計劃票站調查之操作有任何疑問，或發現票站調查有可疑，歡迎隨時向我們匯報。

Press Release on September 5, 2008

About Exit Poll Arrangements for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of 2008

The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POP)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s already uploaded the full list of polling stations selected for POP's exit poll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o be held on September 7, 2008 onto "HKU POP SITE" (<http://hkupop.hku.hk>) for public reference. POP has selected 120 stations plus 64 on reserve. POP's interviewers will conduct the interviews according to prescribed time segments and a random method. They will all wear a uniform with "HKU POP 港大民研" clearly marked. POP respects every citizen's right to accept or refuse such interviews. POP will not publish any projection figure before the close of poll, nor use any such data for election engineering. We welcome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contact us for any enquiry on POP's exit poll operation, or reporting suspicious cases to contact.